

征稿启事

成长在株洲的几代人，很多都拥有自己专属的工业记忆，或许是生产线上的热火朝天，是一张张“劳模”“先进”证书，是一次次获得接见、嘉奖的高光时刻，是基夫赛特炉最后一次关火停炉的黯然神伤；或许是儿时心心念念的奶油雪糕、橙味汽水，是青年人结交朋友的厂办歌舞厅、灯光球场、电影院，是居民们筒子楼里一起做饭、一道带娃的烟火日常；又或者是天南海北口味融合裂变产生的特色小吃，是五湖四海口音汇聚产生的“田心普通话”“331普通话”……

为了记录集体记忆，承载起情怀共鸣，进一步讲好、传播好株洲工业故事，本报开设“我的工业乡愁”专版(栏)，通过广大市民、读者的视角，来讲述记忆深处的“大厂小事”、分享自己与“制造名城”的点点滴滴。我们将择优刊登，来稿请投 zhy83@163.com，期待您的来稿。



曾经风靡一时的南方125型摩托

南方公司 南方摩托

刘文清

究竟是先知道南方公司还是先知道南方摩托，我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。因为那个时候，南方摩托已经风靡大江南北，几乎无人不知。

我与南方公司结缘，是因为叔叔退役后分配在南方公司工作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要从老家到长沙求学，便从郴州坐绿皮火车提前几天来到株洲。凌晨三点多在火车站下车，跟着茂生，迷迷糊糊就上了4路公共汽车，车子在黑暗中颠簸了个把小时，上坡下坡、城市乡村，最后到达了一个山沟沟里。房屋四周都是山，黑黢黢的剪影，茂生说这就是南方公司了——茂生与我同村，年长我几岁，父亲在南方公司工作，属于半边户，他时不时过来看望父亲，轻车熟路——这是我与南方公司的第一次亲密接触。

南方公司全称为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，是我国中小航空发动机和摩托车科研、生产基地，前身是株洲兵工厂，创建于1950年1月，次年更名为“株洲三三一厂”。摩托车并不是南方公司的主打产品，作为军工企业，主要生产军工用品，摩托车只是附带生产的民用产品。我不会开车，也不是摩托车迷，只晓得南方公司生产的南方125型在当时几乎无人不知。据在公司工作的叔叔婶婶和堂弟说，那时候，销售商在公司等十天半个月还不一定能拿到货。1991年第十一届亚运会，南方125型被指定为唯一专用摩托车，出尽了风头。说起这届亚运会，因为时间久远，或许已被人遗忘，但是这届亚运会的宣传曲《亚洲雄风》却留在了几代人的心中。此后，南方摩托还在全国七运会、八运会等大型体育运动会上作了精彩表演。南方摩托家喻户晓，深入人心。

南方摩托的畅销，也带动了周边乡镇企业、村办企业如雨后天春笋般发展、壮大。环绕公司的原郊区建宁乡、曲尺乡、五里墩乡的农兴桥村、南华村、朱田铺村、道田村、五里墩村等农村，依托南方摩托的产品优势，纷纷办起了乡镇企业、村办企业、家庭手工作坊，除发动机之外的摩托车所有的零配件，都可以在这些企业生产。南方公司周边的这些农民，半工半农，有的田地、房屋被公司征用、拆除，极大地增加了收入，率先迈入万元户行列。

假若没有记错，南方公司的第一任厂长应该是吴运铎。这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。他是人民军队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开拓者，为了研发枪弹，手指和腿被炸断，眼睛

被炸瞎，被誉为中国的“保尔·柯察金”，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。吴运铎撰写的自传《把一切献给党》，鼓舞了一代中国青年人。

南方公司所在地董家墩的这个“墩”字也很有特色。在我老家湖南山区，人们习惯称“墩”为河沟，从未见过以“墩”字命名的地儿。九十年代初使用大肚子的286电脑，都无法打出这个字来，只好先将“段”字打印在纸上，然后再用手写上“土”字旁。而在湖南以北三、四百公里之外的株洲市，名字中有墩的地方不少，但知名度最高的非董家墩莫属。为啥呢？因为这里有知名企业叫南方公司，因为南方公司生产的南方摩托……真是把“老子英雄儿好汉”“母凭子贵”这两个词语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暑假寄住在叔叔家等待开学的我无所事事，有的是时间和精力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骑着婶婶的破自行车，经过煤店，上大坡到幸福村；经过总部大操场到建国村、凤凰山脚，到南方中学、职工大学，过桥到医院，再往南到608所。一个刚刚走出中学校门、平生没有出过县城的农村娃，来到这大工厂，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稀罕。骑行还不到半圈，就感觉厂区面积比我老家一个乡的管辖面积还大。厂里有小学、中学、技校，还有职工大学，有百货商场、俱乐部、医院、菜市场……农村没有的这里都有，城市有的这里不缺，一个人从出生、求学、工作、退休直至离世，都可以在厂区内解决。我骑行路过一分厂时，正逢下班时间，只见数以千计的自行车从厂门口蜂拥而出，骑车人清一色工装，不辨男女，你想想在这车流中找到一个熟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这种场面，我只有N年后送孩子上大学时在广西南宁街头见识的小电驴潮可与之相比。

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你说这是农村吗，它却无田可种；你说这是城市吗，它却到处都是“村”：解放村、团结村、建国村、新华村、幸福村、中华一村、中华二村等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更令人惊掉下巴的是，不管是总厂抑或是分厂，厂门口都有解放军(后来才知道是武警)持枪站岗，神圣不可侵犯。所有这些，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，也昭示着南方公司的重要性。

还让我好奇的是，那些极具异域特色的红楼。这些数量不少的两层或三层的仿苏建筑，里面住着援厂的苏联专家，后来成为厂里单身职工宿舍，说是冬暖夏凉，人走在木

楼板上咚咚作响。公司总部边上的大块空地，明明就是运动场，偏偏叫它为“大操场”，无论白天晚上，总是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。

除了南方摩托，南方公司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人和一件事。这个人就是萧芸，其时40多岁的年纪，先在南方幼儿园工作，后来调到南方公司劳服公司工会。萧芸虽是一介女流，却并不简单，胆子很大——萧芸年轻时响应“上山下乡”的伟大号召，在湘潭县一个叫老虎岩的偏远乡村当知青，后来招工进城，进入公司工作——就是她，上书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，请求把知青下放的身份算作工龄，几经辗转，终于得到中央重视并予以批准，为几千万知青做了一件大好事。此事也在公司产生轰动，萧芸一下成了风云人物。

所谓“一件事”，也是冥冥之中命中的一种巧合吧。正是因为这件事，促成了我与《株洲日报》几十年的缘分和情谊。大学毕业的那年七月，在个人英雄主义的促使下，我一个人去了中越边境的广西凭祥市采风，把一路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写成散文《到凭祥去》。当时寄居在南方公司叔叔家的我，来到董家墩邮局(现南方宾馆马路对面)向当班的工作人员打听，如何给《株洲日报》投稿。他告诉我：你写《株洲日报》就行了。我把稿件折叠好后装进信封，再贴上八毛钱邮票，投进了墨绿色的邮筒，怀揣着一颗上下不安的心离开邮局。两个月后，我在南区的一家企业上班了。某天叔叔突然给我送来《株洲日报》的一封信，里面有编辑老师的一封信，大意是告知我稿件收到了，同时通知我去参加报社组织举办的“大地”文学写作培训班。在一个月培训时间里，我有幸聆听了报社聂鑫森、言和平、刘醒波、曾湘文、杨宏武等老师的讲座，如醍醐灌顶般，写作功底有了显著提高。打那后，我不断地给日报写新闻稿、散文和言论，多次被评为报社优秀通讯员。这其中，南方公司及董家墩邮局无意间成了我与《株洲日报》的“介绍人”。

如今，虽然已不住在南方公司那个片区，但我偶尔还是会过去看看，在今昔对比中，追寻着前尘往事。可喜的是，记忆深处的“南方摩托”，在销声匿迹很长一段时间后，又重回人们的视线。兼具智能时尚的新产品让人眼前一亮。果然，有层层的仿苏建筑，里面有援苏专家的传说。希望南方摩托，能永远驰骋在株洲的动力世界里！

当年331厂的厂房

中盐株化的岁月记忆

刘青

在城市的喧嚣与繁华背后，总有那么一方天地，承载着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感和最珍贵的记忆。于我而言，那便是中盐湖南株洲化工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株化)，这个见证了青春韶华、梦想憧憬，收容了我欢笑泪水的地方。

株洲市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，亦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。京广铁路与沪昆铁路在此交汇，使之成为中国重要的“十字型”铁路枢纽。株化便坐落于这片土地，其雄踞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枢纽位置，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便捷的交通条件，成为湖南工业的中流砥柱。

记忆中的株化，宛如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。自1956年建厂以来，历经风雨沧桑，逐步发展壮大。彼时的株化，学校、俱乐部、电影院、工会活动室等设施完备。身为厂矿子弟的我们，背着书包在温暖的家属区内的学校求学，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岁月。放学后，我们在房前屋后尽情玩耍，玻璃弹珠在地上欢快滚动，叠纸板、拼画片的嬉闹声此起彼伏。

中学时代，足球成为我的挚爱。放学后的绿茵场上，总能看到我和伙伴们奔跑的身影。汗水浸透衣襟，却无法熄灭我们心中燃烧的热情。那些在球场上尽情挥洒的时光，不仅锤炼了我强健的体魄，更铸就了我坚韧不拔的意志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虽然耽误不少读书的时间，留下了些许遗憾，但那段充满活力的岁月，让我在往后的数十载里几乎与医院无缘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是株化的高光时刻。工厂效益蒸蒸日上，生活物资发放丰富，各种福利优渥。在那个年代，很多人宁愿选择在株化工作，也不愿去政府机关。成年后的我，满怀着热切期望走进株化的大门，从此与之结下不解之缘。

在公司的那些年，我从事过多种工作，而最为刻骨铭心的，当属那长达十几年的营销生涯。频繁地在全国各地出差，让我饱览了祖国的壮丽山河，感受了不同地域的独特风情。每一次的奔波，虽疲惫不堪，但也充满新奇与挑战。在旅途之中，我结识了众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挚友，他们的故事和经历为我的人生增添了绚丽色彩。那些在火车上的漫长时光，那些在陌生城市街头的匆匆步履，那些与客户谈判的紧张瞬间，皆成为我生命中永不磨灭的印记。

然而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。清水塘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，为了这片土地一片清澈的蓝天、一江碧绿的流水，湖南省及株洲市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，实施湘江流域保护湖南省“一号工程”。2014年，株化启动了关停改制计划。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，我离开了为之拼搏奋斗二十余载的岗位，告别了曾经无比熟悉的一切。

离开株化的日子里，心中始终充盈着无尽的眷恋与不舍。那熟悉的厂房、轰鸣的机器声、同事们亲切的笑容，时常在梦境中浮现。但我深知，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抉择，我们必须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做出牺牲。

如今，我已是在株洲经开区工作数年。凭借在株化多年的磨砺沉淀，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亦能游刃有余。我始终铭记自己是株化的子弟，绝不能给厂抹黑。株化赋予我的精神与品质，犹如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，让我在面对艰难险阻和重重挑战时，无所畏惧，奋勇向前。

株化，是我心中永恒的家园，是我难以割舍的工业乡愁。它见证了我的成长蜕变，见证了株洲这座城市兴衰变迁。虽然它已成为历史的一页，但它留存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，让我在人生的漫漫征途上不断砥砺前行。

岁月悠悠流转，乡愁绵绵不绝。愿这份工业乡愁，在时光的长河中永不褪色，成为我心中温暖且坚韧的力量源泉。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331厂区的苏式专家楼

神农城迹

2024年8月6日
星期二

责任编辑:郭亮
美术编辑:王玺
校对:贺天鸿

那些年 厂矿家属区里的“小确幸”

“好怀念那时候株化的冰棒，甜丝丝的。”“那时候厂矿的工人俱乐部最热闹了，什么新鲜好玩的都有。”“南方公司的大操场，见证我刻骨铭心的第一次心动，还有多少人记得……”

7月30日，本报刊出《我的株洲，我的工业乡愁》专版，网络平台同步刊发后，后台收到不少网友的评论和反馈，与此同时，投稿邮箱中也收到不少读者来稿，分享自己独有的株洲厂矿记忆。

这些鲜活而闪亮的私人记忆有些并不单独成篇，三言两语也着实有味，于是从中挑选了几篇，整合如下——愿这些弥足珍贵的“小确幸”，能让读者诸君会心一笑。

我的童年、少年时代都生活在企业家家属区，住过红砖平房、楼梯房一室一厅、楼梯房两室一厅，街坊邻居都是父母的同事，我放学路上摔了一跤，人还没到家，我妈就已经听说了。路上跟那个男同学多讲了两句话，我妈当天就能在饭桌上绘声绘色地取笑我。

玩伴“贝老爷”家里有台带棚子的三轮摩托车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这可是相当了不得的，开在路上的回头率不亚于现在的法拉利。每天早上，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会在三轮摩托车边上集合，依次坐到后面的斗里，一路欢声笑语去上学，下车时还能享受一把同学羡慕的眼光。有时候在家正吃着饭，邻居会过来(白天不关门很平常)，说他们家炖了牛肉、烧了鸭子，我就端着碗跟着去吃几筷子。有一次，学校举行六一活动，我出了门才发现忘了戴红领巾，对于小学生而言，这无异于“灭顶之灾”，幸好住在隔壁楼二楼的一位阿姨默默递了一切，扔下来一条红领巾解了我的燃眉之急，每当回忆起这一幕，阿姨的样子都会自动带上仙女的光芒滤镜。还有夏季分西瓜、过年时分鱼、“摸坨子”选鸡等欢乐时刻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日常，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“人间烟火气”。

在急难关头出手相助的也是街坊四邻。那年我5岁多，正在读学前班，有天放学走到巷子口，就看到几个邻居阿姨正议论着什么，氛围却不似平时那么有松弛感。“你可回来了，你妈进医院啦……”“啊呀，你别乱讲吓唬她。并非吓唬，你妈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没大问题，医院有人陪着呢，这段时间你就安心住在我家……”我脑子顿时嗡嗡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可我还记得娇娇阿姨紧紧牵着我的手，慧慧阿姨不停安慰我的温柔。爸爸赶回来后，一直在医院忙前忙后，妈妈也一天天好多了。那段时间我住在慧慧阿姨家，和她正在读初中的妹妹睡一张床，每天入睡时就盯着墙壁上的海报出神，那三个男生真好看得，舞姿帅气、衣服洋气，当时我已经有了学前班文化，知道他们叫做“小虎队”。

时光飞逝，一起长大的伙伴们早已各奔东西，就像歌里唱的“有些故事还没讲完就剧终了吧，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……”随着读书、就业、成家，我陆续搬进了一些院子，又与它们挥手告别。走过一程又一程，工厂大院里的那些画面却始终留在记忆深处，化作乡愁的一部分。(李卉)

我是株洲冶炼厂子弟，在花果山生活区住了二十多年。眼下，儿子正在过暑假，我每天上班之余，还要接送他去各种兴趣班，十分疲惫，我总会想起自己的暑假，那时真是没心没肺。

小学时，暑假作业一般要等到开学前三天再奋笔疾书。几乎没有孩子去上学科类培训班，特长班、兴趣班也很少。院子里同龄的孩子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疯玩。吃完早饭就出去玩丢沙包、滚铁环，不玩到一身大汗是不会回家的。午休是不存在的，午饭后，大家就三三两两地来到树荫下。低年级时，主要玩“拍画片”“打弹珠”“躲猫猫”之类的，到了五六年级，也偷偷去电游室、桌球厅，如果被家长抓到，免不了又是一顿臭骂。

有一次，一个朋友被他爸爸堵在游戏室，当众一顿暴打，如今还有人用此事调侃他。有个同学，家里给他买了一台任天堂游戏机，在小区的男孩中引起了轰动，几乎所有人都想去他家玩游戏，后来他爸把手柄藏起来了。等到父母去上班，他就在家翻箱倒柜地找，结果一个暑假都没有找到，最后是开学前夜在书包里找到了。(刘皮波)

我们株化生活区，最让人期待的两个“节日”，一个是元宵节，一个是“冰棒节”。元宵节，孩子们提着父母早早备下的灯笼，吃过晚饭就到处溜达，或呼朋唤友，一大队人马拥挤而过。或偏僻处探险，三五密友说些从家里老人人口中听来的故事。虽然天冷且黑，气氛却着实热闹，到了龙灯队出场的时候，整个生活区就像一锅沸腾的水，游龙舞到哪儿，哪儿就是一片欢快的吆喝声。有些富裕讲究些的人家，会在舞龙队经过时点燃鞭炮，舞龙队就会去这户人家的厅堂、厨房里“游一游”，主人家沾沾喜气、祈求来年丰平顺，临走前再打个小红包，皆大欢喜。

“冰棒节”不是传统节日，是冰棒兑钱点(又叫冰棒点)开张日。到了这一天，父母提前发下的冰棒票终于有了去处，一根绿豆冰棒一张票，两张票一根牛奶冰棒或巧克力冰棒，三张票换支甜筒冰淇淋。最走俏的是巧克力冰棒，哪个冰棒点有货，是孩子们之间最常交换的重要情报。晚上从澡堂里出来，必然去一趟冰棒点，选个心怡的口味，一路吃到进家门，别提多惬意了。(杨多福)